

2010 会是外资家电连锁之年吗

庞大的中国家电市场一向为外资所看好，但是，美国最大的电器零售企业百思买在中国的发展却十分不顺利。进入中国8年来，百思买开店数目不超过10家。外资的水土不服在中国已是常态，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市场已经饱和的今天。

然而，外资企业仍孜孜不倦地在这些区域鏖战。正值虎年，日本的山田电机来了，德国的梅地亚也来了……

外资连锁巨头来了

2009年1月4日，据国外媒体报道，德国最大的零售巨头麦德龙宣布，有关方面已经批准了该公司旗下梅地亚家电超市与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设立合营公司的计划。

梅地亚家电超市年内将在上海开设首家单体家电卖场，并计划5年内开设100家以上新店。目前，访问麦德龙(中国)官方网站，已能看到“家电嘉年华买千返百”的大幅广告。梅地亚家电超市是欧洲最大的家电连锁超市。据了解，麦德龙梅地亚与鸿海去年已达成合营公司协议，双方将各占50%的股权。鸿海集团公告曾表示，两年之内鸿海将与梅地亚合作在大陆开设超过百家门店。

今年，中国的家电连锁市场无疑将迎来很多新面孔。百思买中国此前曾发布今年春季将增开数家门店的消息，另外，日本最大的家电连锁企业山田电机今年也将在沈阳开设其中国第一家店面——山田电机(沈阳)商业有限公司。其近日发布的招聘信息中介绍，这家由日本山田电机株式会社出资成立的公司，将在沈阳开出2万平方米以上规模的店铺。

资料显示，山田电机2008年的销售额约合1260亿元人民币，这与美国同期的销售额相当。山田电机在日本拥有超过1700家门店，2009财年预期营业收入为100.9万亿日元，预期净利润为395亿日元。尽管同比下滑超过15%，但仍然占据日本家电连锁企业第一名，销售额比排名第二的小



岛电器高出一倍。山田电机(中国)商业有限公司、山田电机(沈阳)商业有限公司等已经完成工商注册手续。

同百思买等外资企业一样，麦德龙和山田电机的布局意图由来已久。山田电机早在2008年3月就表示已经完成在上海的选址工作，预计在2010年开出第一家门店。但经过屡次变更，最终选择沈阳作为进军中国的第一步。

内资企业胸有成竹

面对这些蠢蠢欲动的外资巨头，国内企业的反应却很平静。

苏宁市场部经理闵涓清表示：“对于外资的态度我们是一贯的，现在在家电连锁业已不再是竞争导向，而是消费者导向。”国美市场部人士也表示：“我们一直在关注外资机构的动向，威胁和压力肯定是有，但还不构成对业务的实质性影响。毕竟国内连锁业态已经很成熟了。中国的市场空间和外资企业本土市场的萎靡，使它们进入中国成为必然的选择。”

格兰仕生活电器总经理陆骥烈则表示：“毕竟家电销售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争夺，未来城镇化率的提高保证了国内的市

场空间还足够大。外资的进入不会对国内现有格局造成影响。”

事实上，中国市场上的外资家电连锁及泛家电连锁已经为数众多，如快速消费品行业的沃尔玛、家乐福、大润发、好又多、麦德龙、百安居、家得宝。其中以iPhone3G在国内首发为例，百思买凭借其在苹果公司在北美的最大零售商地位，成为上海市场上“最高规格”的苹果经销商。

必须看到，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的有机力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世界是中国的市场。同样，中国也是世界的市场，消费领域尤其如此。开放市场，更需要开放的心态和公平竞争秩序。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已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内资的扶持性待遇则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苏宁、国美新动向

2009年国美的关店潮曾令业界关注，前9个月就关掉了158家门店。国美期待关掉一些选址不佳、业绩不善的门店，改善公司经营。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美日等大多数企业采取了减产裁员、关厂止扩等“收缩过冬”的方式。而从去年四季度末，美日巨头开始相继发布“积极进攻”意味十足的计划来看，目前他们大有卷土重来，蓄势逆袭的势头。作为香港上市公司的国美电器，所采取的关闭效益不佳门店、减缓扩

张步伐、组织流程再造、门店运营机制、环境改造以及顾客服务精益化升级等举措，则不可能没受到大摩、贝恩资本、摩根大通等大股东的压力。

苏宁的动作则更快——威海、无锡、成都、徐州、连云港、镇江、盐城的苏宁电器广场在去年同时开工建设。苏宁试图以自有商业地产的模式，降低在扩张过程中所遭遇的租赁风险，降低运营成本。

2009年12月30日，苏宁电器又正式宣布收购香港第三大家电连锁企业CiticallRetailManagementLtd(简称“镭射电器”)，以此启动在香港的连锁发展，这是苏宁继2009年6月份控股日本老牌家电连锁企业LAOX之后实施的第二例并购。

苏宁电器连锁发展总部执行总裁蒋勇强调，并购只是苏宁连锁发展的一种方式，在香港未来连锁发展上，苏宁将在现有网络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并开始实施自主开店。依据对香港市场发展策略，苏宁电器将在镭射22家门店基础上，标准开发，全面连锁，首先进一步完善核心商圈布局；其次拓展区域商圈和社区型商圈；同时针对目前香港家电零售业态普遍存在的店面过小，消费者购物体验和产品选择不足，苏宁将会在核心商圈选择合适的物业开出4-5家2000平方米左右的旗舰店。

根据上述的连锁发展和经营思路，苏宁电器计划3年内香港新开30家店面，完成香港市场店面网点开发规划，实现50家门店规模，占香港电器消费市场25%以上的份额。

总之，内资企业走出去与国外同行同台竞技、分享海外市场，目前也已经在国家家电连锁业内出现，未来或许还有更多的中国家电连锁企业走向日本、美国、俄罗斯、欧洲等海外市场。

此时此刻，更加需要以开放、合作的心态，看待外资家电连锁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2010年。

(摘自《中国信息报》顾利铭/文)

房企再融资 请公平为先

听惯了房地产调、政策紧缩、提高二手房贷款利率、提高土地出让金首付等消息，最近房企再融资的话题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资金问题是制约房地产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某种意义上，房地产的兴衰是建立在资金的丰枯之上的。正是这一原因，当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时，政府要进行调控，首当其冲的是对金融信贷调控。

现在可以说正处在新一轮的调控过程中，收缩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供给是主基调。然而最近传出的房地产再融资开闸问题又作何解释？

单从再融资角度看，允许房地产上市企业进行再融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既然是上市公司，既然登陆了资本市场，房地产企业就有再融资的权利，只要企业经营是正常的，符合再融资的相关指标规定，放开再融资是早晚的事。

从房地产业发展角度看，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有过热的迹象，适当进行调控的必要的，但调控的对象应该是有针对性。调控不能一刀切，更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对于企业正常的融资需求，要采用条件控制的办法，够标准的就放行，不够标准的予以限制。这样就形

成了一个选择和优胜劣汰的机制。

房地产再融资的放开，必须以公平为准则，杜绝暗箱操作，防止个别企业通过再融资的方式募集资金投资不合规的土地项目，更不允许用股市募集资金囤积炒作土地。在这样的前提下，放开房地产企业再融资才有利于房地产业的稳定。

前些年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出现了太多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行业管理不完善，管理不是强调技术性、可持续性，而是匆忙采取了短期的调控。

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意义毋庸置疑，只

有维护好行业的稳定才能图发展。不能等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才想起房地产业的作用。

现在在经济危机过去了，似乎可以对房地产业任意的蹂躏，其实不然。房地产企业依然是企业公民，人们依然有购房的需求，有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有投资保值的需求。

房地产业的正常发展有赖于行业的细胞——房地产企业的健康发展。通过出台更加具有技术性的政策措施，扶优淘劣，促进产业集中度提升，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房地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在制度层面降低企业操控市场，操控价格的可能，让房地产业回归到正常行业之列，成为稳定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而不是总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争议产业。

(摘自《证券日报》)

如何看待平安职工股解禁

如果一个人投资两万元，苦干18年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如今收获200万元回报，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算得上是“暴富”神话吗？这个投资年回报率相当于29%，高出GDP增长2.5倍，算是不错，如果手段正当合法，那“赚”得其所，无可厚非。这就是中国平安职工股从入资到解禁的回报。

近期中国平安发布公告，3月1日起由3家职工持股公司持有的8.6亿股将进入流通时代，这些股票可在5年内分批减持，按目前市值计算，约为387亿元。股票被1.9万名中国平安职工和高管持有，通过本报测算，持股成本约7.8亿元，最长的持有时间18年，增值100倍。

但此消息引起一片哗然，机构纷纷抛售，2月23日中国平安股价大跌8.88%，创下其上市以来第二大成交量，也是当天A股市场成交金额最大的一只股票。平安股价大跌还拖累A股整体走弱，当日上证指数下跌0.69%。

人们对中国平安的争议，不只是其职工股解禁消息带来的股市下跌，更多的是对1.9万人身价过百万、公司高管马明哲坐拥7亿元财富的不满，进而引发对中国平安员工分享公司成长红利的合理性质疑，而且这种质疑，从马明哲天价年薪开始，就一直困扰

着中国平安。

但盲目的仇富心态，并不能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我们反对用不公平和不道德的手段敛取不义之财，但我们更提倡通过勤劳、坚韧和智慧来创造和获取财富，只有当整个社会能够对“阳光下获取的财富”报以欣赏和鼓励，同时通过健全法治来保证创造财富的“过程平等”时，才有可能实现国民共富、社会共赢。

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高速发展的过程，也是狂热的“造富”过程。据胡润研究院统计，在我国目前100亿级富翁有200人，10亿级富翁2000人，亿万富翁约5万人，而千万富翁约80万人。美林全球财富管理公司和凯捷咨询最近公布的《2009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富豪人数首次超过英国，上升至全球第四位，甚至有望在2013年超越北美。

这个规模庞大的富人群体，主要产生于房地产、制造和金融等行业，我们相信其中不乏合法创富者。但历年“胡润富豪榜”被称之为“杀手榜”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很多富人的存折都经不起阳光的暴晒。更有不少“无法统计”的富人，或利用权钱交易巧取豪夺，或腾挪国有资产秘密分赃，这种“无本万利”的财富来源，才是造成当前社会仇富心态的

根源。

另一种仇富，来自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收入差异。一些国有企业和部门，以保障员工福利之名行私分全民财富之实，将利用资源垄断获取的暴利，慷慨地分配给内部员工。其中引起巨大非议的例子，就是2008年底的“中石油购房门”事件，当时中石油集团下属的北京华油服务总公司，以单价每平方米不到万元的价格，团购了北京太阳星城的8栋住宅楼，而当时该楼盘均价23000元。

反观中国平安的造富过程，却是经过了22年的持续发展和18年的波折等待。1988年成立时公司只有13人，几乎白手起家，但22年过去了，公司总资产由当时的5312万元达到2009年的8732亿元，净利润也由1988年的482万元达到2009年的105亿元。1992年开始，公司开创性地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首先以平安职工合股基金方式出资2236万元认购了当时10%的股权，其后又几经增持达到目前的持股规模。相对创造出资产增长1.6万倍、净利润增长2178倍的业绩而言，相对打造出了中国最大最成功的金融企业而言，中国平安职工股股权价值的增值，比起那些几十亿、上百亿身家的股市新贵们，应该是合理、公平的。

中国平安减持消息一出，就有媒体采访

“肠子都悔青了”的平安老员工，他们或者当初不愿参与内部职工股的申购，或者早早地把股权转卖、退出。只有一直坚持下来，伴随平安一起创造巨大商业成功的那部分人，最终收获了可观的投资回报。可以说，中国平安的员工创富过程值得称赞。

市场没有必要担心职工股的解禁，这反而能把一个公司的内在价值，更充分地暴露在投资者面前。企业内部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者比普通投资人更了解公司的情况，他们对自家股票的买卖，可以成为我们判断公司价值的风向标。如果中国平安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它的员工和高管对公司股票的态度，应该是增持而不是减持；而如果限售股流通后，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抛售，投资者到是要小心了。

不过，想经得起社会的质疑，中国平安应进一步将职工持股透明化。究竟8.6亿股股票是不是全都由内部职工持有？职工股的分配机制是否能起到激励员工的效果？是否存在“赎买权力”的特殊股票？这些疑问只有充分公开才能得以消释，而职工持股公司代持的方式，让原本阳光的财富蒙上了一层不必要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平安应该取消代持机制，由职工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把更多的持股信息披露出来，让市场检验。

财富只有更阳光和正当，才能促进公平；市场只有更透明和自由，才能变得健康。不是吗？

(摘自《投资者报》)

节日文化 经济门槛太高

“正月十五闹元宵，家家户户乐逍遥。”元宵节自古就是中华民族最热闹的节日，可以说是中国的狂欢节。记者采访发现，我国传统元宵节的“闹”劲有所弱化。

其实，不仅元宵节的“闹”劲有所弱化，我们的整个节日文化都存在类似问题。

央视春晚里也有儿童的形象与身影，但儿童不是主体。春晚本身就是一道门槛，成人式的话语与娱乐，容不得儿童分享或共享。

春节期间笔者还参观了由中国美术馆，这里主办了年画大展，展览可以说美不胜收，可惜观展者并不多，参观的孩子更少。年画里有相当多的儿童形象，反映过去时代儿童过节时的状态，可惜里面没有儿童观赏区。为什么不设传统儿童春节游艺的内容呢？比如请民间艺人教儿童制作年画或小工艺品，播放皮影戏、木偶戏等。美术馆还可以对在校学生免费，而当时的门票是20元，这就将很多孩子拦在了门外。

因为低门槛、无门槛的游戏场所极少，使得节日期间庙会、公园里的收费游戏场所不但人满为患，而且价格上涨不少。像鸟巢里的冰雪世界，门票更高达180元，里面许多项目还得另交费，而孩子们可以玩的，也就是爬上一米高的雪墙，自玩自乐。这样的游戏效果与设置，与孩子们在野地里游玩并无区别。

笔者期待，明年能不能专门为儿童制作一台春晚，各地能不能为儿童举办专门的免门票的庙会、元宵灯会？博物馆、美术馆能不能为贫困家庭儿童或外来务工者的孩子，赠送门票与节日礼品？主流社会应该意识到，今天我们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家的文化未来投资。

节日文化的经济门槛太高，孩子们踮起脚尖也看不见里面有什么热闹，对此，成人社会应感到惭愧。

(摘自《新京报》吴祚来/文)

让农民工生活更有尊严

元宵一过，当下就成为农民工进城寻工的集中时期。能否就业，不仅关系他们个人及其家庭的生计，更关系到他们的尊严。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和网友交流时，再次就“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进行了阐释和强调。眼下，如何保障农民工的尊严，尤其需要和值得我们关注。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1.5亿农民工外出打工。他们主要从事采矿、钢铁、纺织、建筑、餐饮等工作，干着相对脏、累、危险的工作，却只能得到相对较为廉价的收入，有的甚至因为某些不良企业主和包工头的恶意拖欠和赖账，屡屡被迫以跳楼等极端的、屈辱的方式进行讨薪。

保障农民工的尊严，不仅需要我们不断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努力为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创造就业机会，还需要注重公平正义把“蛋糕”分好，让农民工收入得到相应合理的增长；不仅需要更多像黄陂信义兄弟这样守信践诺的企业家，更需要健全法律法规，使农民工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如今，许多农民工和家属常住城镇，却很难找到“家”的感觉，因为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他们还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尤其是，“80后”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打拼出美好的未来，而不愿像父辈一样候鸟般地迁徙，或做城市的“边缘人”。

(摘自《湖北日报》张进/文)

比“问题豇豆”更可怕的是潜规则

问题豇豆在武汉曝光后，三亚农业部门表示对武汉的做法“特别的不理解”，认为这样做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太不够朋友”，不仅没有给三亚市留面子，也没有给农业部留面子。(2月28日中国广播网)

平心而论，因问题豇豆遭曝光而怪怨武汉，确实有些说不过去。道理很浅显，既然有违规使用高毒农药这一事实存在，那么，即便不被武汉发现，也要在其他的地方被发现；即便不在豇豆身上反映出来，也会在其他果蔬上反映出来，这只是早晚

的事情，实在怨不得别人。

不过，三亚农业部门的这番抱怨，倒使我们知道了一个比问题豇豆更可怕的事实，即存在于相关执法部门中的潜规则。按照这个潜规则，武汉在发现豇豆农药残留严重超标后，不应该公开曝光搞得消费者知根知底，而是要遵循通常的做法，通过事先“打招呼”、“内部通报”，让相关单位自己来决定怎么收拾这个摊子，否则，就“太不够朋友”，就

没有给兄弟单位“留面子”。

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重要，还是政府部门的面子重要？显然，三亚涉事部门更看重的是后者。虽然在三亚，也有像模像样的农业执法机构，也曾大张旗鼓地禁止销售、使用高毒农药，但在潜规则的作用下，一切都形同虚设。不出事，你好好大家好，万一出了纰漏，也有内部通报、打招呼这样的潜规则关照，自己到时候只要

想办法“救火”就行了。至于消费者受到何种程度的伤害，只要内部不将实情捅出去，又有谁知道？

问题豇豆不仅严重影响了市场消费信心，也给种植户和经销商带来重大经济损失，更直接败坏了涉事企业的市场信誉。不过我们应该看到，问题虽然出自豇豆，其根源却在潜规则上。试想，如果执法部门不是依仗潜规则高枕无忧，而是严格执

法，通过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并果断地做出相应处理，问题豇豆何至于猖獗至今的地步？显然，要避免类似事件再现，首先就必须打破部门或行业中的种种潜规则，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在食品监管中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算问题豇豆遭到清算，也难以会有别的问题“××”再出江湖。

(摘自《沈阳日报》)